

廖名春 陈兴安 译注

●建国以来首次集中了儒、释、道三家精华的译文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译丛书
全

春秋 氏呂 全译

ZHONGGUOGUD

AIZHEXUEMINGZHUQUANYICONGSHU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呂氏春秋
全譜

全

譜

廖名春 陈兴安 · 译注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

吕氏春秋全译

四川出版



四
書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氏春秋全译 / (战国)吕不韦著; 廖名春, 陈兴安
译. —成都: 巴蜀书社, 2004.5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
ISBN 7-80659-591-0

I . 吕... II . ①吕... ②廖... ③陈... III . ①杂家
②春氏春秋 - 译文 IV . B229.24
语 - 译文 IV . B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7919 号

吕氏春秋全译

廖名春 陈兴安 译注

责任编辑 侯跃生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 (028)86656816
网址 www.bsbook.com
发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86662019 8665827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
版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125
字数 473 千字
书号 ISBN 7-80659-591-0/B·89
定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

凡例

一、本丛书是高层次的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全译丛书。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通过译本即可直接承继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使国外读者可直接依据今译成外文，以利中外文化交流。

二、本丛书可供研究者参考，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以适应中国文化研究向深层发展的需要。

三、本丛书选取中国古代著名的，较为难读、又较为完整的哲学论著分批进行今译。第一批选题二十四种。

四、本丛书每一译本均吸收古今各家成果，忠于原著精神，突出哲学思想。

五、本丛书每一译本均分为译文、原文两部分，译文用现代简化字，原文用繁体字。

译文前均有一篇较长的研究性述评，文中各编多有题解。

译文部分附必要的注释，原文部分附必要的校勘。

六、今译是本丛书的主体部分，译文尽量做到信、达、雅，要准确信实地译出原意，要用精确、流畅、规范的现代汉语表达出原著的哲学思想，力求体现原著风格韵味。不拘于直译、硬译。

七、注释是今译的补充部分，一般在译文确实无法传达原著哲学思想，或古代语辞确实无法译成现代汉语时，加注释。

注释在充分领会前人成果基础上，断以己意，力求简明扼要，避免繁琐罗列。但有价值的不同意见，必须列出。

注释一般用脚注。

八、校勘体例仿照《二十四史》校点本。本丛书每一种书所依据的底本，尽量选用业经整理的较好版本。

九、本丛书每一译本一般附以哲学范畴、命题索引和参考书目索引。根据具体情况，或设或不设人名、书名索引。

哲学范畴、命题索引以原文为主。

总序

任继愈

在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统一方针指导下，我们与巴蜀书社合作，编辑了这套《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

世界各民族不论大小，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它对人类文明已经做出过伟大的贡献。伟大的贡献，有赖于民族思想文化的成熟。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成熟的标志。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忧患和灾难。但是，忧患和灾难并未使它消沉，反而使它磨炼得更加坚强，在与困难和挫折的斗争中，它发展了、前进了。在前进的过程中，中华民族认识着世界，改造着世界，同时也改变着自身。

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在中国哲学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其深闳的内容，明睿的智慧，在古代社会，和其他民族相比，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中国哲学，在当时，无愧于自己的时代；在今天，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人类社会的不

断前进，随着对历史的深入剖析，中国哲学的内容和它的价值，将日益被更广大的人群所认识、所接受。

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有责任对世界文明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是要创造新的物质文明和新的精神文明，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求借鉴，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素养，是个必要的途径。

借鉴中国古代哲学，广大读者首先遇到的麻烦，是语言文字的障碍。本丛书的目的，就是为广大读者扫除这个障碍，使得更多的人能从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中得到启迪，锤炼他们的智慧。

汲取前人的文化财富（包括哲学、文学、科学、艺术），都应该直接取自原作，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事实上，能做到这一点的，总是少数人。所以从古到今，都有一些人在从事翻译。有不同文字的互译，也有古籍今译。缺少这个工作，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就不可能成为广大人民的财富。

古文今译，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司马迁撰写《史记》，曾把商周的文献典籍译成当时流行的语言，树立了成功的范例，使诘屈聱牙的古代文献，被后世更多的读者所理解。古希腊哲学为后世欧洲哲学的源头，今天的欧洲人（包括今天的雅典人）了解古希腊哲学，很少有人直接阅读古希腊文原著，人们多是通过各自民族的现代译文，去了解古希腊哲学，这是学术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任何译作（古文今译，异国语文互译）都难做到毫不走样。但我们要求本丛书的译文，除了对原文忠实外，还要尽力保持原著的神韵风格。这是我们争取的目标，并希望以此和广大读者共勉。

前　　言

《吕氏春秋》是先秦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主编是秦国著名政治家吕不韦。

吕不韦（前 284？—前 235），《战国策·秦策五》说他是“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史记》本传说他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公元前 259 年以前，他“贾于邯郸”，发现了在赵国做人质的秦昭王之孙异人。吕不韦认为“奇货可居”，就与异人达成协议，他出资策划让异人成为秦国的王位继承人，而异人如立为君，就得分国与他共治。于是吕不韦以重金西游于秦，说服安国君及华阳夫人，使异人被立为嫡嗣。“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史记·吕不韦传》）。十四年后秦昭王死，安国君即位，是为孝文王，立异人为太子。第二年孝文王卒，异人即位，是为庄襄王。秦庄襄王一即位，就以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兑现了当初的诺言。三年后，秦庄襄王逝世，才十三岁的太子嬴政登上了王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

父”（同上）。九年后，嬴政才亲自执政。从庄襄王即位到嬴政亲政的这一十二年里，吕不韦一直执掌着秦国的国政，是秦国权力最大的几个统治者之一。随着嬴政的一天天长大，吕不韦的焦虑与日俱增。嬴政独断专行的作风、刻戾凶残的性格和偏好法家的治国方略都与吕不韦格格不入。因此，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一书。书成后，“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同上）。其目的是想通过此举来宣扬自己的治国纲领，依靠舆论来确立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和权威性，以迫使即将亲政的嬴政按他的治国主张和施政原则办事，从而维持秦国的长治久安，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但秦王嬴政亲政之后，并没有接受吕不韦的设想。他先借嫪毐之事“欲诛相国”，因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才“不忍致法”（同上）。第二年（前 237）十月，免除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并把他赶出朝廷，逼他“就国河南”。而吕不韦在京城盘桓了一年多，“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同上）。在这种情况下，“秦王恐其为变”，就赐书于吕不韦，不但矢口否认吕不韦的功绩，而且要把吕不韦全家流放到蜀地。吕不韦担心被诛，只好饮鸩自杀。

《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序意》篇提供了线索：“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据清人孙星衍考证，“秦八年”是指秦国八年，即秦庄襄王灭东周后的第八年，亦即秦王嬴政即位的第六年（前 241）。这一年吕不韦的门客接受了编纂该书的任务，向吕不韦请教，吕不韦于是阐述了编纂《吕氏春秋》的宗旨和意图。由此看，《吕氏春秋》当是公元前 241 年开始编纂的，大约编了两年。编成后就赶在秦

王嬴政亲政（前 238 年）之前公之于众^①。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一书的宗旨和意图决定了《吕氏春秋》是一部讲治国之道的理论著作。它的自然哲学、历史观、科技思想等等，都是为阐发其治国之道服务的。因此，谈《吕氏春秋》，必须以它的政治思想为重心。

《吕氏春秋》虽然系吕不韦的门客“人人著所闻，集论”而成，但它的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却是吕不韦思想的代表。因此，它并非杂乱无章，彼此矛盾，而是有一定的系统、明确的中心。

《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公天下”说。《贵公》篇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就是说天下并非哪一个人的私产，而是天下人所共有的。因此，它以先王为榜样，主张治国要“先公”“不私”：“昔者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去私》篇也说：“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霸。”相反，如果“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序意》）。“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同，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公故也。”（《务本》）这种“公天下”说，意义不亚于《礼记·礼运》篇的“天下为公”说，是先秦政治思想的精华。

从“公天下”的前提出发，《吕氏春秋》对“君道”进行了重点阐述。它认为“昔太古尝无君矣”，人类为了“裁万物，制禽兽，服蛟虫”，和自然界作斗争，就必须结成群体，而群体需要有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就是君主。“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

^① 说详见洪家义《吕不韦评传》第 97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也”，“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焉”（《恃君》）。这就是说，设立君主是出于天下百姓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君主的私利。对于不行君道、违反天下百姓公利者，人民有权废掉他。

《吕氏春秋》认为君道应当“无为”“贵因”。所谓“无为”，并不是说无所作为，而是指君主谨守其职分，不矜能妄为。它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者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任数》）君主应当顺应自然，依靠臣下，无为而治；臣下应当各尽职责，奋发有为。这其实是一种虚君实臣论。

何以要倡导君道无为呢？这主要是因为君主负有“利天下”的责任。君主拥有至高至重的权势，他的智识又是有所局限的，所以高明的君主治国，要在“任数”无为、“审分”“无躬”。“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则分定，分定则下不相隐。……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主无不安矣，以此治国，国无不利矣；以此备患，患无由至矣。”（《圜道》）人君如不行此，而好为人臣之事，就会有所蒙蔽，受人利用。“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知度》）这才是掌握了“治道之要”、为君之术。

那么君主怎样才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呢？

第一，要知贤善任。《知士》说：“今有千里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千里马也，相得然后成，譬之若抚之于鼓。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得千里

者，其惟贤者也。”贤能之士是人君成就功业的千里马，是否任用他们是关系国家治乱兴衰、君主荣辱成败的关键。《观世》说：“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固（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国相望，囚主相及，得士则无此患也。”人才是如此的难得、宝贵，因此，君主必须慎察之，诚求之，礼遇之，信用之，贤人才会归附他，为他效力。

第二，要审分正名。为君之道要在“因而不为”，“君者固无任而以职受任”（《分职》）。君主只要“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审其类，无使放悖”（《审分》）。从而使“智愚工拙，皆尽力竭能”（《不二》）。这便是治国的妙要至道。

第三，君主要审己修身。在封建君主制下，君主拥有无上的权力，如果不加以束制，他就很容易自傲轻物，恣肆放纵，招致身死国灭的结局。因此，《吕氏春秋》特别强调君主应注重修身葆性，反求诸己。“何谓反求诸己也？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涂（途）”（《论人》）。就是说君主要节适情欲，顺天全生。而且，君主应当自知而不自智，谦逊而不轻物，它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读，轻物则无备。无备招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骄恣》）有自知之明，有知人之智，又能节欲去私，这是为君的基本条件，因为古代的圣王就是“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治身是治天下的根本，“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执一》）。

综括言之，君主能做到知人善任，正名审分，又能反己修身，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就会平治天下，建树功业。

《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之上并作为其重要内容的德治思想。这种德治思想，承继了西周以来“敬德保民”的优良传统，而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法家政治思想相对立。

《吕氏春秋》主张民众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务本》说：“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明确指出君主、国家的根本系于民众，认为“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爱类》）。既然如此，君主该怎样做到“以民为本”，固本宁邦呢？《吕氏春秋》认为，首先要顺应民心、民欲。它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顺民》）提出“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论威》），这是人的自然欲望，应予引导和满足。“故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无不立矣。”（《为欲》）

其次，要爱利百姓，这是德治思想的核心。《适威》说：“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爱利百姓的内容包括轻赋敛、省刑罚、不夺时扰民、劝赏耕作等，爱利百姓的方式也不一而足，随时而异，“民寒则欲暖，暑则欲冰，燥则欲湿，湿则欲燥。寒暑、燥湿相反，其于利民一也”（《爱类》）。要在顺应民心，从民所欲。

第三，为政以德，辅之以刑。针对法家专任法术、严刑重罚的偏弊，《吕氏春秋》提出了以德治为主、以赏罚为辅的治国方策。它说：“为天下及国，莫若以德，莫若以义。以德以义，不

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闾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上德》）因为“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爱士》）。就是说以德治国，就可大建功业，无敌于天下。在坚持德治的前提下，赏罚可以作为治民的辅助手段。“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用民》）赏罚必须符合道义的原则。“凡赏非以爱之也，罚非以恶之也，用观归也。所归善，虽恶之，赏；所归不善，虽爱之，罚”。（《当赏》）但是，赏罚又不足以专恃，“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心咎矣”（《用民》）。

此外，《吕氏春秋》主张对民众施以教化，它对忠孝的提倡，对学习重要性的强调，以及把音乐放在突出的地位加以论述等等，都体现了它以仁义治国的德治思想。

《吕氏春秋》作为一部讲治国之道的理论著作，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在自然观、运动观、认识论等方面，有许多深刻的认识。

宇宙的本原是什么？天地万物是如何生成的？《吕氏春秋》批判地吸收了道家的精气说，形成了更严密、更系统的宇宙论。《大乐》说：“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行。”这里有必要首先弄清“太一”的涵义。《周易·系辞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正义》云：“太极即是太初、太一也。”也就是“道”。“道”又是什么？

它和精气是什么关系？

《大乐》说：“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通过对《大乐》所引两段文字的分析，我们认为“太一”是指宇宙的初始形态和本质构成，“道”是指宇宙生成的规律和运动状态。说得更明确些，“太一”就是化生天地万物的精气。这么理解有何依据呢？“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大乐》）高诱注云：“两仪，天地也；出，生也。”就是说由浑沌莫状的“太一”生成天地，随而形成阴阳两大对立的力量。阴阳是什么？阴阳既指自然界两种对立的势力，又是化生万物的元质。《有始》云：“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微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夫物合而成，离而生。”天由轻微之物上升而成，地由重浊之物下沉而成，天地交合而生成万物。这种构成天地的物质就是精气。《圜道》云：“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构成天地的基本要素是精气。“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同上）精指精气，亦即阴阳之气，这是说阴阳二气的消息变化形成春夏秋冬的更替。《知分》说：“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万物皆出自“太一”即精气，化于阴阳。换句话说，天地万物都统一于精气。“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有始》）“众耳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异”。就是说万物在统一于精气的共性下有差异性。

在坚持这种朴素的精气说的基础上，《吕氏春秋》反对天命观和鬼神思想。《知分》说：“天固有衰康废伏，有盛盈蚕息；人

亦有困穷屈匮，有充实达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数也。”万物和人事都有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不受任何神秘力量的主宰。自然运动有自己的规律，人必须依据各类自然现象的观察，才能认识“天”。“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当赏》）这种天道自然观，完全摆脱了那种把天看成是人格化的上帝或是冥冥中的宇宙主宰的观点，是对荀子“天道自然”思想的继承。

《吕氏春秋》认为天地万物的性质及其运动具有客观必然性，不受任何人的支配。“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故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贵当》）“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任地》）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人只能听任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摆布，人们可以认识这些规律，并遵循规律来改造自然为人谋利益。《圜道》云：“一也齐（者）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圣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出号令。”《论人》说：“凡彼万形，得一后成。故知一，则应物变化，阔大渊深，不可测也；德行昭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时之，远方来宾，不可塞也；意气宣通，无所束缚，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则复归于朴……故知知一，则若天地然，则何事之不胜，何物之不应？”这种“法天地”、“知一”的思想，体现了《吕氏春秋》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勇于探求客观规律的可贵精神。

《吕氏春秋》认为精气以及由此化生的天地万物都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中。“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赚废伏，有盛盈蚕息；人亦有困穷，有充实达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数也。”（《知分》）人